

# 近十年来国内中非文明互鉴研究述评\*

王 恪 彦

**内容提要** 本文以 2015 年下半年至 2025 年上半年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文献为对象，对近十年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研究内容围绕概念范畴、历史传承和实践领域三大部分展开，全面总结了国内学界的主要观点和研究进展。国内学界除了对相关概念进行探讨外，主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历史方面主要梳理中非文明交流的传统渊源及其对双方文化发展的影响；现实方面则集中讨论当前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途径、模式及成效。综合来看，过去十年中非文明互鉴研究取得明显进步，深化了学界对中非文化交流内涵和机制的理解，但在自主理论框架构建和研究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尚存不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拓展。未来深化中非文明互鉴研究应着力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入互动发展，为新时代中非合作贡献更多智力支持和文化力量。

**关键词** 中非关系 文明互鉴 全球文明倡议 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王恪彦，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2015 年 12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明确把“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列为中非合作五大支柱之一。<sup>①</sup>2018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00—2021）”（项目编号：23&ZD325）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57 页。

进一步提出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强调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新时代中非人文交流提供顶层设计和思想指引。<sup>①</sup> 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再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倡导中非共同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明确提出“文明互鉴伙伴行动”，打造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建立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中非研究中心，深化双方治党治国经验交流。<sup>②</sup> 受此时代背景与政策方针的驱动，近十年来国内关于中非文明互鉴的研究不断深化，学术产出显著增长，在理论探讨、历史渊源和现实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学界已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中非文明互鉴的历史基础、价值理念、互动机制与现实路径。然而，目前尚缺乏对既有研究的系统梳理与阶段性总结。本文依托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对2015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十年间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评述。经检索，主题同时包含“中国”和“非洲”且全文内容涉及“文明互鉴”的CSSCI来源期刊（简称“C刊”）合计189篇。如图1所示，近两年研究热度明显上升。鉴于此，本文旨在适时总结国内已有成果、发现研究不足，从而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在学术上有助于全面认识中非文明互鉴研究现状与问题，在实践中为新时代中非人文交流合作提供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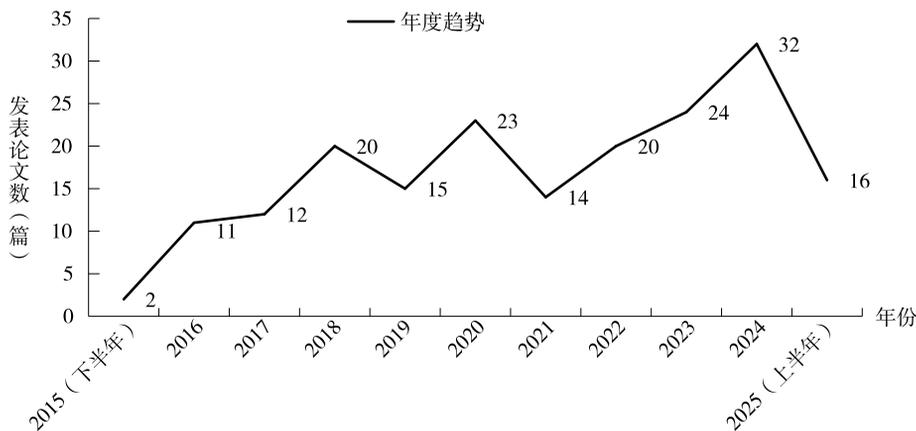


图1 近十年中非文明互鉴国内C刊发表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检索数据自制。

全文分别围绕概念范畴、历史传承和实践领域三大主题展开论述，对相关研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50页。

② 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5页。

究成果进行分类评述。最后总结主要发现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拓展中非文明互鉴的应用空间，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持续发展。

## 概念范畴相关研究

厘清中非文明互鉴的概念范畴，既是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深入研究中非文明互鉴的前提条件。现阶段，学界不仅界定了中非文明互鉴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范畴，还基于中非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等研究框架展开深入探讨。伴随研究的纵深发展，学界不断进行理论反思，推动了研究范式的跃迁。

### （一）中非文明互鉴的内容与范畴

文明互鉴通常被界定为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吸收并融合对方的文明成果，使其内化为自身价值体系或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sup>①</sup> 已有研究指出，中非文明互鉴之所以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在于双方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倡导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理念，主张平等互助、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社会理想。<sup>②</sup> 非洲文化中影响广泛的乌班图（Ubuntu）哲学，强调“我因我们而存在”，突出个人与群体的相互依存、彼此关怀、团结合作的关系伦理，这种观念与中国哲学的群体主义伦理高度契合，构成中非文明互鉴在哲学思想上的基础。<sup>③</sup>

在哲学思想的具体阐释层面，近年来国内学界形成了两种既互补又存有差异的理论路径。有学者指出，中非文明互鉴的核心在于通过哲学会话与比较，围绕合法性问题、存在论域、思维逻辑、个人与群体关系以及社会政治哲学五大议题，旨在通过双向互释，突破以西方哲学为唯一尺度的思维框架，建构更加普遍且适合中非双方哲学的话语体系。<sup>④</sup> 也有学者以非洲哲学家西奥菲勒斯·奥克雷（Theophilus Okere）的“自我”思想为切入点，强调非洲哲学根植于非洲特有的

① 谢清果：《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72—83页；吴志成、李佳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4—25页。

② 李新峰、谷亚平、陈阿龙：《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思想基础、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5期，第25—47页。

③ 王东旭：《非洲文化哲学：源流、内涵与重塑》，《世界哲学》2024年第1期，第138—150页。

④ 徐克谦：《全球文明倡议下中非哲学会话比较的若干思考》，《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第26—50页。

社群主义传统，以非文本形式体现于社会实践之中，主张中国哲学应在与包括非洲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交流互鉴中获得创新发展。<sup>①</sup> 上述两种路径，前者侧重哲学范式的普遍性诉求，后者则强调本土文化的实践关怀，二者共同勾勒出中非文明互鉴的哲学范畴。

在实践领域，文明互鉴的范畴具体而多元，主要集中于艺术与手工技艺、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知识共享、文化产业与数字传播、智库知识生产五大互补场域，并形成“理念共识—文化交流—知识共建—产业合作—技术赋能”的链式结构。<sup>②</sup> 中非双方致力于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互补性，搭建联合研究智库，深化哲学和伦理观念的对话，在产业合作与技术共享中实现立体互动。<sup>③</sup>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同时提醒在文明互鉴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误区。例如将文明简单视作对外竞争的软实力、将文化交流视作单向输出、片面强调他国学习本国文明等观点，都背离了文明互鉴的本意。只有摒弃上述错误认知，坚持文化自信、平等交往、虚心学习的原则，才能确保中非文明互鉴行稳致远，使其成为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的建设性力量。<sup>④</sup>

## （二）中非文明互鉴的研究框架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首次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以来，该理念已演变为学界阐释中非文明互鉴的核心理论框架。中非命运共同体被广泛理解为一种区域合作的新范式，核心内涵包括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个方面。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理念既承袭了中非传统友谊，也体现了当前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共赢的基本准则，彰显中非合作在国际交往中的示范作用与价值取向。<sup>⑤</sup>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逐渐凝练出三个主要维度。一为历史共鸣，即中非双方曾经历反殖、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历程，这段共同

① 吴兴德：《西奥菲勒斯·奥克雷的非洲哲学“自我”思想及其实践启示》，《世界哲学》2023年第4期，第126—136页。

② 郭佳：《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中非文明互鉴》，《文学遗产》2023年第6期，第18—23页。

③ 李新烽、吴传华：《大力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红旗文稿》2022年第18期，第46—48页。

④ 李新烽、谷亚平、陈阿龙：《中非共建现代文明：思想基础、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第25—47页。

⑤ 张忠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挑战与应对》，《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第133—139页；吴传华：《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12—21页；贺文萍：《以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人民论坛》2024年第17期，第72—75页。

历史经历奠定了彼此交往的情感基础。<sup>①</sup> 二为理论范式，即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核心，体现为“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是中非合作的理论支撑。<sup>②</sup> 三为价值共识，即双方共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普遍性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深化文明互鉴，从根本上消解文明冲突与文化偏见的隐患。<sup>③</sup>

针对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的互动关系，学界多采用历史分析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例如，有学者通过回溯中非历史上形成的政治互信与情感联系，探究历史经验如何为当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情感与理论支持。<sup>④</sup> 也有学者强调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既应体现历史延续性，也必须关注新时代背景下文明互鉴的实践创新与方法论启示。<sup>⑤</sup> 此外，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非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区域合作范式的具体实践，也反映出南方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战略诉求与发展抱负，因而具有更广泛的国际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sup>⑥</sup>

同时，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亦逐步成为研究中非文明互鉴的重要理论视角。一般而言，全球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非强制力量主导，通过跨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机制。这一治理框架源起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转型时期，旨在实现全球多元文明合作共生，拒斥以西方为单一尺度的霸权模式。

国内学界之所以强调以全球治理为框架研究中非文明互鉴，主要缘于中非同属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国家，拥有共同历史记忆与现实需求，尤其是在抵制西方霸权、推动多极化世界秩序等方面高度共鸣，文明互鉴可以为全球治理合作奠定坚实基础。<sup>⑦</sup> 此外，将中非文明互鉴置于全球治理语境中，有利于彰显非西方文明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性，彰显文明间对话的平等性，抵制西方特定治理模式的强行推广。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尊重文明多样性、通过文明对话达成治理共识的思想，并被广泛视为

① 张颖、潘敬国：《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涵义》，《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期，第39—45页。

② 罗建波：《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3—20页。

③ 杨维春：《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意蕴与实践》，《人民论坛》2024年第18期，第107—109页。

④ 张颖、潘敬国：《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涵义》，第39—45页。

⑤ 贺鉴：《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思想战线》2023年第2期，第57—68页。

⑥ 贺文萍：《以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第72—75页。

⑦ 李安山：《全球治理与中非合作：逻辑动因、历史基础与现实需求》，《当代世界》2024年第9期，第9—15页。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理论尝试。<sup>①</sup>

总体来说，近年来基于全球治理框架的中非文明互鉴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有学者尝试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结合，从区域互动角度分析全球治理如何通过区域合作模式影响中非文明互动交流，例如聚焦中非在联合国、非盟及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中的治理经验。<sup>②</sup> 还有学者运用历史与现实问题交织的方法，分析中非双方在联合国改革、国际经济秩序重构、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共识与实践，以“南南合作”和“发展优先”等原则为核心打造全球治理新路径。<sup>③</sup> 此外，部分学者立足文明理论的宏观视野，探讨中非如何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超越西方主导的传统范式，建构符合双方发展诉求和价值观的治理理论框架。这类研究特别重视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的培养，强调治理援助与当地文化的契合性，以文明自主性为前提，推动非洲治理现代化进程。<sup>④</sup>

### （三）研究范式的嬗变

随着中非文明互鉴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理论探讨也经历了显著的范式跃迁，主要体现为叙事、知识生产和方法论三重转变。

从叙事范式层面看，早期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文明冲突论”正逐渐被多元文明互鉴视角取代。近年来，有研究通过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宗教交往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冲突模式在不同文明互动中的显著差异性，从经验层面对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命题提出修正与批判。<sup>⑤</sup> 同时，也有学者基于对中非关系历史叙事的分析，指出早期中非关系曾被塑造成超越国界、民族与肤色的“想象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强调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理想抱负，但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双方发展路径调整，中非关系逐步从“想象的兄弟关系”转向现实主义的伙伴关系。<sup>⑥</sup> 这种叙事视角的变迁意味着学界逐渐摆脱早期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关系叙事模式，转而侧重从多元互动和现实利益出发审视文明互动关系。

① 张倩红等：《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与实践探索》，《西亚非洲》2024年第1期，第3—24页。

② 郑先武：《全球治理的区域路径》，《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第50—60页；卫白鸽：《中国与非洲在联合国事务上的50年合作》，《中国非洲学刊》2022年第2期，第60—75页。

③ 李安山：《全球治理与中非合作：逻辑动因、历史基础与现实需求》，第9—15页。

④ 宋微：《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第1—21页。

⑤ 曹兴：《三地教缘冲突落差对“文明冲突论”的证伪》，《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第38—42页。

⑥ 李小云、张传红：《想象的兄弟，还是现实的伙伴？——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文化纵横》2022年第4期，第14—22页。

在知识生产范式上，学界正逐渐摆脱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引入—译介”模式，转向中非共建共享知识体系。具体而言，有学者提出构建“中非共享知识体系”和“中国非洲学”路径，通过以非洲本土田野研究为基础，结合跨学科方法，重塑研究的现场感与在场性，从而消解传统欧美知识体系在议题选择和理论验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sup>①</sup> 也有学者强调必须加强案例研究与批判理论结合，以批判性视角和本土经验纠正以往宏观叙述视角过于单一、缺乏地方性视野的问题。<sup>②</sup> 这些转变表明，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正由单向传播模式向中非平等主体共同建构模式转型，体现了非洲研究话语权的深刻调整。

方法论范式的嬗变同样显著，近年来学界逐渐摆脱传统“援助—受援”的研究模式，转而采纳“平行经验分享”和治理经验相互借鉴的新思路。有研究提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应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技术与制度视为可互相交流和学习的资源，摒弃传统单向度的援助模式。<sup>③</sup>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背景下，有研究强调治理援助必须尊重受援国本土的治理路径，主张通过共同认可的指标体系开展项目评估，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互鉴。<sup>④</sup> 此外，也有研究从全球治理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其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中非双方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治理机制中的制度创新潜力，这种研究路径体现了学术界对自治、协商、互鉴等治理理念的深入理解。<sup>⑤</sup>

上述三个层面的范式转变不仅体现了中非文明互鉴研究内部理论路径和话语结构的深刻变迁，也反映出近年来学术界对于非洲研究主体性、知识共建模式及治理合作机制的持续反思与深入探索，共同构成当前中非文明互鉴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中非文明互鉴的概念范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初步形成涵盖哲学内涵、理论框架与范式转变的学术体系。相关研究明确了文明互鉴的核心内涵与基本范畴，通过比较中华大同思想与非洲乌班图哲学阐释双方文化的契合点，并引入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视角，为研究提供了宏观分析框架，丰富了文明互鉴的理论意义。

① 刘鸿武：《“非洲学”的演进形态及其中国路径》，《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63页；刘鸿武：《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非共享知识体系的建构》，《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42—60页。

② 李安山、刘少楠：《文明互鉴、知识生产与地区研究——李安山教授谈非洲研究的中国之路》，《区域国别学》2024年第1期，第175—199页。

③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17—135页。

④ 宋微：《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第1—21页。

⑤ 李安山：《全球治理与中非合作：逻辑动因、历史基础与现实需求》，第9—15页。

## 历史传承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中非文明互鉴的历史渊源及传承脉络，开展系列研究，主要聚焦不同时期中非交往的史实、文化传播与价值互鉴等议题，并阐释了历史经验对当代中非文明互鉴实践的启示意义。

### （一）古代交往期

围绕中非文明互鉴的历史渊源，国内学界对古代中非交往的深入研究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表明，中非文明互动与交流并非近现代产物，而是源远流长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学界进一步明晰了古代中非交往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史料辨析研究着眼于中国历史文献中涉及非洲的记载，重点探讨诸如“昆仑奴”的来源问题。通过对汉唐史料的考证，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黑人并非如早期学界普遍认为的仅源于东南亚，而是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非洲地区，并且非洲黑人很可能在唐朝以前就出现在中国社会。例如，非洲南部岩画中描绘了戴中国式尖顶斗笠的人物，暗示古代非洲人可能接触过来自中国的航海者，由此证实中国人与非洲人在古代已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sup>①</sup>

郑和下西洋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范畴。学者们通过重新考证郑和远航非洲的路线、随行物品、人员交流及与当地互动等细节，指出郑和航行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行动，更是一次深层次的文明交流与互鉴。<sup>②</sup>一系列的文献与物证为古代中非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古代中国的瓷器、铁器等沿海路传入非洲，而非洲的特产如长颈鹿、象牙等亦进入中国视野，也展现了双方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

此外，学界针对明代以来中非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也进行深入探究。大量史料研究表明，中非文明交流虽在方式上发生显著转变，但仍持续不断，例如中国和非洲的商品、技术和文化通过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商人始终保持流动。尤其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交易上，非洲长期对中国货物保持稳定需求，非洲特产

① 李安山：《古代中非交往史料补遗与辨析——兼论早期中国黑人来源问题》，《史林》2019年第2期，第203—218页。

② 李新烽：《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62—182页。

如香料、象牙、犀牛角等也持续输入中国，这无疑体现出明显的双向互动特征。<sup>①</sup> 文献研究揭示，清代广州等港口作为明清时期中非商品交流的中转站，客观上发挥了连接中非文明的桥梁作用，商品交换构筑了中非民间持续交流的重要基础。明清时期中非交流并没有真正中断，而是受新航路开辟以及近代殖民的影响，经历了一种从官方主导向民间主导的互动模式转型。<sup>②</sup> 这种对转型模式的认识刷新了学界对古代中非交往连续性的理解，也进一步强调了文明互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多样性及韧性的特征。

以上研究成果在共同指向古代中非文明交流具备平等、互动与多样性的同时，也提醒后续研究需要警惕历史解读中的“中心主义”倾向，避免将中国视为古代文明交流的单一主导者，应注意非洲在古代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才是文明互鉴的本质。

## （二）近现代开拓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双方逐步开启了全面的文明交往，1955 年万隆会议标志着新中国对非交往的正式开端。在冷战背景下，中非双方因反殖、反帝、谋求民族独立的共同历史境遇，在情感层面迅速建立起深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政治理念的趋同，更表现为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探索上的深刻共鸣，显著推动了双方文明认知的深入。<sup>③</sup>

具体来看，有研究通过档案再考察指出，1956—1965 年中国将非洲定位为革命外交的重要舞台，对非援助从“量力而行”到“全面支持”不断升级，其核心目的在于联合非洲的中左翼力量反帝反修，构建国际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在这一时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援助以及人员培训等方式，在非洲初步塑造了文明形象，并逐渐赢得非洲社会广泛的政治与文化认同。<sup>④</sup> 中非交往并非简单的物质援助，更体现为社会主义文明价值观的传播，展现了文明互鉴实践的具体路径与机制，即中国输出革命理论与治国思想，非洲国家则在这一过程中思考自身发展道路，对中国经验予以关注和吸收。

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非洲革命和建设

① 邓吉忠：《中非交往视野下的文明史观——读沈福伟〈中国与非洲：3000 年交往史〉》，《中国图书评论》2024 年第 8 期，第 123—128 页。

② 张忠祥：《艾周昌教授与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00—110 页。

③ 李新烽：《百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32—44 页。

④ 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第 81—108 页。

的影响，从方法论上展现了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坚定支持非洲独立运动，实质上为非洲国家探索自主发展模式 and 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通过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案例研究，学界深入探讨中国如何以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影响非洲国家的制度建构与发展选择。<sup>①</sup>

另有研究聚焦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过程中如何共同应对国际舆论。针对西方世界试图以“新殖民主义”抹黑中非关系的做法，国内学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严谨梳理批驳这些论调，明确指出近现代中非交往的本质是互相尊重的文明交流，而非西方指称的资源掠夺。学者通过历史个案，深入揭示中非合作模式的独特性和公平性，强调非洲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始终保持足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sup>②</sup>

### （三）新时代深化期

进入 21 世纪，中非合作论坛创立标志着中非文明互鉴迈入制度化、机制化的新阶段。自 2000 年论坛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这一新型合作平台展开大量深入研究，认为中非合作论坛不仅深化了双方在物质领域的互动，也为精神文明交流和文化认同提供了长效机制与有力保障。

从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学界通过梳理中非合作论坛 20 年来的历次峰会及相关成果文件指出，这一机制有效推动了文明互鉴的具体落实。论坛经过九届部长级会议和四次峰会，已成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其合作理念契合非洲发展需求，并且注重狠抓各项举措的落实。这种多层次机制安排，使得文明互鉴能够持续稳定地开展，而非依赖临时性的项目安排或短期政策推动。<sup>③</sup> 基于此，有研究聚焦论坛的开放包容性特征，具体分析论坛如何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和人文互动深化双方的文明认知与精神交流。论坛不仅在教育援助、医疗卫生合作和文化交流领域持续发力，也通过媒体合作、智库对话等机制，增强双方社会的文明互信与理解。这些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促进了民众层面的文明互

① 邓延庭：《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探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9—91 页；朱斌：《毛泽东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贡献》，《现代哲学》2024 年第 6 期，第 44—52 页。

② 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 70 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西亚非洲》2019 年第 4 期，第 50—72 页。

③ 沈晓雷：《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发展与贡献》，《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80—93 页；张忠祥、陶陶：《中非合作论坛 20 年：回顾与展望》，《西亚非洲》2020 年第 6 期，第 53—77 页；李安山：《中非合作论坛二十周年：历程、成就与思考》，《当代世界》2020 年第 10 期，第 17—23 页。

鉴，推动中非友好深入社会肌理。<sup>①</sup>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还进一步阐明论坛在中非合作中的战略意义与全球视野。通过分析对非援助项目的实施，研究指出论坛体现了对非洲自主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尊重，不再是简单的援助—受援模式，而是更为复杂的经验互鉴与治理互动。这种模式转变体现了中非合作进入新阶段，也展现了文明互鉴从理念走向制度实践的具体进程。<sup>②</sup> 在定期交流机制及议题设定下，论坛通过持续的政策沟通和文明互鉴成果展示，维护了中非关系的正面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对非合作的新话语体系。<sup>③</sup>

在新时代理念层面，中国对非外交提出的“真实亲诚”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成为深化文明互鉴的指导原则。研究指出，“真实亲诚”与“义利并举”的核心主张体现了中国在新时代处理对非关系时的价值取向：真心实意支持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同时与中国自身发展紧密结合，实现共同发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朝着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的方向持续发展，并在各领域取得长足进展。尤其在文化上，双方都强调相互借鉴对方文明成果的重要性，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丰富了中非关系的人文内涵。这种合作理念通过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体现出的相互尊重与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双方文明的深层理解与互鉴，也有效回应了国际舆论中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批评。<sup>④</sup>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传承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揭示了中非文明交往悠久且内涵丰富的史实脉络。相关研究详细考证了古代中非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历史细节，例如汉唐文献中对“昆仑奴”的记载，以及郑和下西洋期间深层次的文明互动，证实了双方平等交流、互通有无的传统。对近现代中非互动交流的研究表明，中非在反殖民与独立运动中形成的情感纽带与价值共鸣，是构成当代文明互鉴的重要历史基础。新时代以来，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代表的机制化交流，则进一步将历史情谊转化为制度保障。这些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中非文明互动连续性与多样性的理论认识，为当代中非人文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

① 周玉渊：《开放包容的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的前景——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主线》，《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1—26 页。

② 宋微：《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第 1—21 页。

③ 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 70 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第 50—72 页。

④ 张颖：《中国对非洲外交：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27—40 页；罗建波：《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第 3—20 页。

## 实践领域相关研究

近十年，国内学界针对中非文明互鉴在各领域的实践，开展系列专题研究，围绕政治、教育、文学、传播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探讨中非文明互鉴在具体领域中的实现途径和影响，为全面把握当代中非文明互鉴提供多角度方向。

### （一）政治方面

国内学界针对中非文明互鉴实践层面的政治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集中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政党外交、反腐败合作以及和平安全治理等具体领域。这些研究不仅涉及宏观战略层面的解读，更深入具体操作层面及政策效果的评估分析，体现了研究深度与细致程度。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政治领域互鉴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近年来，学界提出中非之间的治理经验交流不仅聚焦经济改革路径，更扩展到对外开放战略、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安全治理领域等更深层次的经验分享。学者特别强调，这种交流已从单一的经验输出转向相互学习，非洲国家在肯定中国经验的同时，也反过来提供本土知识的参考，推动双方交流逐步走向均衡互惠。<sup>①</sup>尤其在治理现代化议题上，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实现战略对接，不仅推动双方治理经验的交流与融合，更彰显了中国方案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价值。

政党外交是中非政治文明互鉴的另一重要视角。近年来，学界指出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多国政党的交流已成为官方交流的重要渠道，并在经济合作等其他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双方通过政党间的互动协商，推动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教育合作等项目有效落地。这种政党层面的深入互动，为双方关系提供更具深度与持续性的制度保障。<sup>②</sup>

在反腐败合作研究方面，学界也逐步深化相关探讨。研究认为，非洲国家对廉洁治理的高度关注与反腐败的“中国方案”具有高度契合性与借鉴价值，中非反腐合作可以成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通过缔结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等多边协议，已初步形成系统化、常态化的反腐合作框架。<sup>③</sup>

① 张春：《非洲安全治理困境与中非和平安全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2—117页。

② 兰曾妮：《中非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国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与主要功能》，《国际观察》2025年第1期，第25—51页。

③ 李新烽：《铸就风清气正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反腐败合作的重要意义》，《人民论坛》2019年第32期，第118—119页。

在和平安全治理议题方面，国内研究强调非洲安全问题从传统军事冲突逐步向非结构性暴力、恐怖活动和跨境犯罪转型，而非洲自身治理能力尚不足以应对新挑战。因此，研究者主张中非双方通过共同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加强包括治安维护和能力建设在内的合作，进一步推动非洲治理模式的转型与现代化。<sup>①</sup>有学者亦注意到中国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态度谨慎，避免卷入地区冲突，更倾向于推动治理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等软性治理手段，体现了文明互鉴的平等与尊重原则。<sup>②</sup>

## （二）教育方面

近十年相关研究表明，中非教育合作自 21 世纪逐步走向体系化，中国秉持平等互利、应需施助、量力而行、注重实效、以双边为主兼顾多边等原则开展对非教育合作。合作内容覆盖教育体系的人才、资金、信息和机构等方面，致力于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全方位双向教育合作交流体系。<sup>③</sup>

在合作理念指导下，中非教育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过去较单一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为更务实互惠的双向合作。<sup>④</sup>教育合作具有双重效益，一方面有助于非洲提升人力资源水平，促进自身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中非经贸关系发展，为双方开拓了新的市场和合作空间，实现了教育与经济的双赢。这些实践表明，教育合作正在成为中非文明互鉴中双方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有力纽带。

同时，学者们也对中非教育合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刻反思，以期提高互鉴成效。一项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指出，目前中非教育合作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参与主体单一、合作关系不平衡、中国对非洲学研究的积极性不高、非洲留学生教育质量和援非教师水平有待提升、合作项目的执行与评价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导致教育交流合作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从而影响文明互鉴的深度。具体而言，有研究者强调当前合作存在单向性倾向，过度依赖中方资金和技术，对非洲本土教育发展的边际效用有限。可见，要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必须避免将教育合作简化为单方面输出，而应促进非洲本土教育能力提升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有鉴于此，有学者建议中国对非教育援助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和创新

① 王洪一：《非洲安全新挑战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99—111 页。

② 张春：《非洲安全治理困境与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第 102—117 页。

③ 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7—30 页。

④ 同上，第 19 页。

性，在项目设计上强化与非洲实际需求的匹配度，注重培养非洲本地师资和职业技能人才，实现“授人以渔”而非仅“授人以鱼”的长期效益。<sup>①</sup>这一理念为中非教育合作注入文明互鉴的使命：通过教育传播知识和理念，缩小发展鸿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观交流。

### （三）文学方面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文学领域的中非文明互鉴关注颇多。非洲文学在经历殖民与去殖民书写后，形成一种包容多元的美学，既体现强烈的非洲本土特色，也具备与异质文明积极对话的世界意识。这种特质使非洲文学凭借其独特的混杂性，丰富了世界文明的交流维度。

然而，学界也清晰意识到，实现文学层面的真正互鉴仍面临诸多阻碍，其关键在于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阐释霸权”问题。以加纳作家 A·阿尔玛 (A. Armah) 的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为例，作品中源于非洲本土的荒诞意义长期被西方存在主义解读所遮蔽，这实质上侵蚀了非洲文学的自主话语权。<sup>②</sup>此外，翻译与改编实践虽为文明互鉴提供路径，但也潜藏误读风险。比如，尼日利亚对中国名剧《雷雨》的改编，完全以本土化策略进行，虽初衷良善，却导致情节与原作严重背离，反而容易加深刻板印象，甚至产生新的文化误解。<sup>③</sup>

因此，有研究强调译介活动须在忠实与灵活之间实现平衡，谨慎选择文本，增强译者文化自觉，以避免出现文化交流适得其反的尴尬局面。对此，近年来国内学界努力构建自觉的理论框架，强调文学传播须立足本土、尊重差异，不盲从外国理论；翻译中也提倡实现“归异平衡”，即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适当尺度，推动中非文学互鉴从单向传播转向真正平等的双向互动。<sup>④</sup>这一系列主张为中非文学互鉴指明了机制建构的方向：即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下，通过“平视”的交流态度和平衡式的译介策略，消解文化鸿沟，实现真正的双向文化渗透与创新。

① 陈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第119—132页。

② 邹涛：《从非洲文学看西方理论视角的阐释霸权——以〈美好的人尚未诞生〉为个案》，《中外文化与文论》2023年第2期，第147—161页。

③ 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163—184页。

④ 朱振武：《中外文学的传播互鉴与归异平衡——以“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构理路为中心》，《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第50—58页。

#### (四) 传播方面

传播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重点涉及媒体、影视、语言、出版及数字传播等领域。学界强调，通过构建自主传播主体及多元互动机制，能够有效破解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主导的困境，推动文明间真实的交流与理解。具体而言，中国在对非传播中，应转变单一视角，力求从非洲自身的实践与需求出发，反向建构适用于非洲的中国话语体系，打破传统的西方叙事框架。<sup>①</sup> 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全球南北方媒体关于中国春节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南方国家”媒体往往以友好合作和文化共享的积极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而西方媒体则充斥政治化的消极框架。研究指出，过去那种淡化中国元素的对外传播策略存在局限，强调应践行“群众路线”争取“南方”受众，在传播内容上实现中华文化特色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融合，以提升中国叙事在非洲的亲合力和认同感。<sup>②</sup>

视觉传播方面，中非影视合作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路径。中国主流媒体制作的中非关系纪录片以个体叙事手法塑造亲和形象，跨越文化障碍，赢得非洲受众的情感共鸣。<sup>③</sup> 但中非影视剧交流存在显著不平衡：很多中国影视产品进入非洲市场，而非洲影视作品鲜少进入中国。有学者针对中国与坦桑尼亚等国合作实践提出，应加强产业对接，推进影视合作工程，增强非洲本土制作能力，形成真正双向交流机制。<sup>④</sup>

语言推广是推动中非文明互鉴的关键环节之一。中文在非洲传播效果显著，不仅丰富了非洲语言生态，也促进当地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有学者主张中文教育需实行“一国一策”，因地制宜开发适合本土需求的教材，注重培养非洲本土汉语师资，推动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sup>⑤</sup>

出版传播合作近年来受到重新审视。中非均经历了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进程，这种相似的历史记忆为深化出版交流合作提供了文化基础。研究强调，应以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借助联合出版平台，讲述双方发展实践背后的故事，使物

① 李玉洁：《中国对非传播的话语体系构建：思维、路径与方法》，《世界民族》2023 年第 6 期，第 28—39 页。

② 赵月枝、王欣钰、王一竣：《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国春节——基于全球南/北方媒体报道的话语研究》，《当代传播》2025 年第 1 期，第 55—65 页。

③ 李勇强：《中非关系主题纪录片的艺术表达》，《当代电影》2019 年第 10 期，第 99—102 页。

④ 张勇：《中非影视合作：路径、问题与对策——以坦桑尼亚为例》，《当代电影》2017 年第 10 期，第 139—143 页。

⑤ 王辉、郑崧：《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中文传播的实践进路》，《西亚非洲》2022 年第 5 期，第 86—108 页。

质合作向情感交流延伸，进一步加深民众层面的认同与共鸣。<sup>①</sup>

与此同时，数字传播领域的合作快速兴起。非洲国家将数字经济视为发展新动力，中国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正契合其需求。为克服基础设施薄弱与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学界建议中非加强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及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提升双方的数字化能力，共同缩小数字鸿沟，以推动文明互鉴向纵深拓展。<sup>②</sup>

### （五）其他方面

除以上主要方面外，中非文明交流互鉴还体现在经济、医疗、体育以及民间交往等众多领域，展现出互鉴空间的多样性与嵌入性。

经济合作是中非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已多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国地位。然而研究表明，经贸合作虽成果显著，但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并未同步增长，亟待强化人文交流。<sup>③</sup>

传统医药合作近年逐渐引发学界关注。研究指出，中非同属传统医药资源丰富的文明体系，双方正探索共建传统医药知识保护机制，推动三方共赢合作模式，即持有人、开发人和使用人共享利益。<sup>④</sup>这一模式不仅关涉医疗产业，还有益于文化遗产及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凸显文明互鉴的深层意义。

有研究梳理了中非体育交往六十余年历史，指出其经历了初创探索到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的历程。中国长期派遣体育人才赴非洲，协助提升当地竞技水平；非洲运动员亦频繁来华训练比赛。这种互动超越语言障碍，形成深厚情感联结，在当下社交媒体时代继续发展新的互动形式，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互鉴价值，更为基层的民间交往和文明互鉴提供了生动细节与活力。<sup>⑤</sup>

此外，有学者以义乌非洲商人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发现日常社会互动明显增进本地居民对非洲人的认同，面对面的交流逐渐消除双方的偏见与误解。<sup>⑥</sup>旅

① 胡钰、李亚东：《全球文明倡议下中非出版合作的文化基础与实践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24年第5期，第95—104页。

② 牛东芳、沈昭利、黄梅波：《中非共建“数字非洲”的动力与发展路向》，《西亚非洲》2022年第3期，第66—87页。

③ 葛顺奇、刘晨：《非洲经济增长与中非经贸合作前景》，《国际贸易》2018年第8期，第9—16页。

④ 冯洁菡、周濛：《“一带一路”中非传统医药合作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5期，第1—22页。

⑤ 刘官元：《中非体育互动60年历史演进与现代意义》，《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第19—24页。

⑥ 许涛：《“文明交流互鉴”对中外民间交往实践的指导意义——基于义乌民众与外籍商人社会交往的调查与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第170—178页。

非华侨华人群体在民间交往中的角色日益突出，尤其是“华人酋长”成为典型案例。这些华人因积极投身当地经济与公益事务，获封酋长称号，并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研究同时指出，应注意平衡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语境，以正面形象促进更深层次的民间互动。<sup>①</sup> 华侨华人在非洲的整体形象也受到重视。当前部分赴非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良行为时有发生，影响非洲人对华侨华人的整体认知。因此，学者建议加强对侨民培训，鼓励他们主动适应当地文化与遵守社会规范，充分利用公共外交和媒体资源，推动华侨华人形象正向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文明互鉴的目标。<sup>②</sup>

围绕实践领域相关研究，近十年国内学者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传播、医疗等多方面全面剖析了中非文明互鉴的途径与成效。这些研究揭示，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教育合作、文学译介、媒体传播、经贸与民生交往等领域，中非双方正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互动实现文明互学互鉴，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政党外交和治理合作增进了互信，教育上双向人才交流构建了共同发展的纽带，文学艺术上译介对话丰富了彼此文化视野，媒体传播和数字合作则拓展了民众层面的理解。这一系列成果从实践层面论证了文明互鉴对深化中非关系的独特价值，丰富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维度。

##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中非文明互鉴逐步形成了融合历史与现实的综合分析框架，深化了对文明互鉴内涵、模式和规律的理解。历史研究拓展了文明互鉴的时间与空间维度，表明中非文明交流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持续性。现实研究则突出文明互鉴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增进民心相通的积极意义，丰富文明互鉴的理论案例，为新时代中非关系提供重要的人文支撑，也为政策实践提供文化理解与合作共赢的指导思路。国内学界在中非文明互鉴研究方面虽有不少成果，但也面临明显的局限，主要集中在理论、方法、话语建构及知识结构四个层面。

第一，在理论层面，部分成果仍未摆脱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依赖，或带有不平等与单向灌输倾向，导致自主理论构建和创新不足。例如有研究在评价文明成就时过于倚重物质标准，而忽视精神文化因素，这种“文明物化”问题受到

① 许亮：《中非民间交往中的华人酋长现象探究》，《西亚非洲》2023 年第 3 期，第 51—73 页。

② 张梦颖：《非洲华侨华人形象的历史演变与提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63—71 页。

质疑。<sup>①</sup>历史上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文明优劣论”“文明等级论”余毒尚未彻底清除，依然在一些叙事中若隐若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典型体现。但国内已有学者通过宗教冲突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程度加以反驳，指出文明间冲突并非必然，且中非文明都高度推崇和谐共生，西方理论中“零和博弈”的冲突范式套用于中非互动上显然存在理论误区。<sup>②</sup>对此，研究应着力强调文明交流必须摒弃单向思维，坚持双向互动，承认文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不分高低优劣，反对孤立封闭。这一平等的文明交流原则，已成为当前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共识。<sup>③</sup>同时，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缺乏有效整合，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范式；大量讨论偏重宏观论述，缺乏实证支撑，未能充分融通中非双方学者的视角。这些不足使得对文明互鉴概念的理解仍有提升空间。

第二，研究方法与学术生态方面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一些研究实证基础较弱，缺乏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尤其是“智库热”导致部分研究者在缺乏深入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匆忙发表政策建议，使得研究趋于表面化和功利化。有学者已尖锐指出，这种过度强调应用对策、急于回应决策需求的倾向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客观性与深度，导致对非洲的描述缺乏历史与文化厚度，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层面的真实关切。<sup>④</sup>针对这一困境，学界开始呼吁回归扎实研究，以国际前沿成果为参照，夯实知识储备，循序渐进提升理论与研究方法。<sup>⑤</sup>

第三，在话语建构层面，平等互鉴原则体现得不够充分，中非文明互鉴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沟通障碍。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要么过度追随西方理论，要么对本土理论信心不足，致使中非交流叙事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或居高临下、带有优越感地看待非洲文明，或表现出无原则的谦卑。这种缺乏“平视”姿态的叙事模式，严重削弱了中非文明对话的真实有效性。<sup>⑥</sup>此外，国际话语霸权的影响依然严峻，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的负面报道频繁，导致国际舆论环境不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更多体现为友好合作的叙事风格。

① 李安山：《论国际关系史中的平等观念与文明互鉴》，《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44—62页。

② 曹兴：《三地教缘冲突落差对“文明冲突论”的证伪》，第38—42页。

③ 邓吉忠：《中非交往视野下的文明史观——读沈福伟〈中国与非洲：3000年交往史〉》，第123—128页。

④ 李安山、刘少楠：《文明互鉴、知识生产与地区研究——李安山教授谈非洲研究的中国之路》，第175—199页。

⑤ 同上。

⑥ 朱振武：《中外文学的传播互鉴与归异平衡——以“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构理路为中心》，第50—58页。

这一南北方传播话语的巨大差异，凸显中国对外传播策略过往“低调克制”的不足。为此，学界提出应更积极地与全球南方受众对话，通过融合中华特色与普遍人类价值的叙事框架，主动提升中国文明叙事的亲和力与包容性，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建立公平的国际舆论环境。<sup>①</sup>

同时，目前研究视角多偏重于中国一方，未充分发掘非洲文明的主体作用；此外，对非洲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关注不足，区域差异性未能得到充分揭示，削弱了结论的普适性。对非洲本土史料和考古证据的运用不足也限制了跨区域与多文明比较的视野，从而导致对特定历史阶段和区域交流状况的认识不够全面。

第四，知识结构严重不对称同样构成研究的深层障碍。全球知识生产长期被西方主导，非洲和中国文明屡遭边缘化乃至曲解。非洲长期被误解为“文明荒漠”，其文学、哲学、艺术等的丰富价值更因西方的刻板成见而长期遭受忽视。同样，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极为有限，如“诗圣”杜甫直至 2020 年通过英国 BBC 纪录片才真正进入西方公众视野。这种不对称的知识结构致使国内学界认识非洲文明时也常因信息不充分而有失偏颇。<sup>②</sup> 对此，有学者提出加强非洲人文领域的研究，以重塑更加平衡、公正的全球知识版图，充分展示非洲和中国文化的真实样貌与丰富性，打破西方单一叙事垄断，促进全球文明的公平对话。<sup>③</sup>

面向未来，中国学界需要克服当前研究局限，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的互动发展。2024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将中国与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关系层面，整体定位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定位为深化中非文明互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学界应以此为契机，在理论创新方向上，首先应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融合多元理论资源，构建自主、系统、具有中非特色的文明互鉴理论范式。其次，应充分借鉴非洲本土学者的观点，平衡中非双方视角，加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经验数据的积累，深化理论诠释与整合。<sup>④</sup> 再次，应深入挖掘中非双方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资源，探索文明融合与创新的发展路径。最后，构建平等对话的中非文明话语体系，增强非洲文明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影响力，推

① 赵月枝、王欣钰、王一竣：《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视域下的中国春节——基于全球南/北方媒体报道的话语研究》，第 55—65 页。

② 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第 163—184 页。

③ 郭佳：《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中非文明互鉴》，第 18—23 页。

④ 李安山、刘少楠：《文明互鉴、知识生产与地区研究——李安山教授谈非洲研究的中国之路》，第 175—199 页。

动建立更公平的全球文明认知框架。

在深化实践方向上，未来研究应紧密联系现实需求，强化基于田野调查的微观研究，避免宏大而空泛的叙事，通过跨学科合作丰富对中非互动机制的理解，关注全球文明倡议等新议题，推动理论提升与实践进步相融合，并深入挖掘非洲文明的主体性，从更广阔的文明史视角推动历史层面的中非文明交流研究。此外，还需加大非洲语言、历史和文化人才的培养力度，推动中非学者在更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进行联合研究与知识共建，不断拓宽对话渠道，形成更具深度与创造力的合作范式，以推动文明互鉴理念在实践层面的落实，提升中非研究的专业水平。<sup>①</sup> 只有加强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在反思中创新，在实践中检验，才能持续提升中非文明互鉴研究的生命力，为中非合作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陈雅慧)

<sup>①</sup> 张倩红等：《全球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与实践探索》，第3—24页。

**Mandate Expansion and Role Misalignment:  
 Th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Limits of IGAD**

*Liu Xiaolan and Wang Tao*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 reveals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functional expans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6, IGAD has undergone three major functional shifts: from 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ody initially focused on combating climate disasters, to an entity with security functions centered on conflict mediation, and later further developing into a 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y dedicated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evolution was not driven by endogenous capacity building, but rather constituted a passive response to external agenda – setting and regional crises. Consequently, a structural disconnect has emerged between its mandates and its capabilities, manifesting as chronic resource shortages, limited agenda – setting autonomy, and a lack of political consensus among member states. Thus, despite notable successes in specific cases such as mediating the Sudanese civil war, this structural misalignment continues to severely constrain IGAD’s overall performance in social development,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Unless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functions and capacities is resolved, the organization will continue to face the risk of marginalization in its core areas of operation.

**Keywords:** IGAD, Horn of Afric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flict resolut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Authors:** Liu Xiaola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Wang Tao,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Wang Keyan*

**Abstract:** This review examines studies on mutual learning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published in China’s core academic journal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15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5. The literature is organized into three parts: conceptual scop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practical domains, and it summarizes key viewpoints and research progress. Beyond conceptual discussion, scholarship advances along two main lines: the historical line and the reality – oriented line. The historical line traces traditional roots of China – Africa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s on both cultures. The reality – oriented line analyzes current channels, models, and outcomes of cultural and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s. Overall,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 has made clear progress and has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mechanisms of China – 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However, gaps remain in building co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diversify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Future efforts to deepen research on mutual learnings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civilizations should foster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greater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cultural strength to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Civilizations Initiative (GCI),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 Wang Keyan, Ph. D. Candidate of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